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毛志成著 ● 重庆出版社

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毛 志 成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王从学

封面设计：乔楠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毛志成 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75 插页3 字数252千
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7,300

书号：10114·214

定价：1.37元



作者近影

毛志成小传

一九四〇年生于北京大兴县，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北京师专，先后在中学、大学任教，现为北京师范一分院讲师，中国作协会员。七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先后搞过评论、历史研究、诗歌。后致力于小说创作，著有短篇小说集《乌纱巷春秋》、《福相女》、《留下指纹的孩子》等，中篇单行本有《对门儿》、《神秘的箱子》等。一九八五年有长篇《我与本城告别》、《谛听你，大地》等问世。

在创作风格上主张写人的气质、性格，并将其融汇于具有时空感、现实感的社会生活中。尊重民族化，强调可读性。

目 次



小镇风情·····	1
珊瑚白·····	100
大门道的主人·····	137
芳草抽芽时节·····	217
落花时节又逢君·····	326
后记·····	403

小镇风情

“姻缘”一词，自古就有二解：一是指婚姻，一是指瓜葛。当然，更不排除二者兼而有之的意思。

小镇上有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，人们说她是倾镇美人儿。不过，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倒只是由于她那见人就腼腆的性格；她很招人爱怜。老实说，路途相遇，她哪怕是躲在女伴的身后偷偷地朝我甜甜地一笑，我也要甜滋滋地乐个小半天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说不清。反正，象我这种身世的人，是常常对一个人尚能腼腆给以不寻常的珍重的。腼腆的人往往是不轻易施笑于人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她能把甜甜的一笑施之于我，我也就从这笑容中看到了自己的投影：仿佛还是个不坏的人。人有了这种感觉，总归是幸福的，好象整个世界也就格外亮堂一些。

然而，这女孩子不知从哪一天起，再见到我时，一下子竟变腼腆为庄重，即使当着别的女伴，也敢挑战似地径直迎

着我走来，庄庄重重地叫一声：“姐夫……”

如此说来，我一定和她的某位姐姐有什么“姻缘”了。其实，我至今仍是近四十岁的鳏居者，就是说，不是她三位姐姐中任何一位的“那口子”，而且此后也永远不可能。

无疑，这是要使人们感到奇怪的。

本来嘛，在这小镇上，我是一个中学的美术教师。贱姓“唐”，人们对我的泛称自然只限于“唐老师”。可这女孩子偏要叫我“姐夫”，当然要被别人怀疑为别有“姻缘”的。总不会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模样长得“凶”，有一脸刮也刮不净的络腮胡茬，看人的时候又有一种死盯着对方的毛病，从而把她吓得失了口的缘故吧？

不，不是的。平心而论，如果说瓜葛也算是“姻缘”含意之一的話，我和这女孩子的一家倒也算是有过姻缘的，甚而可以说，至今也未完全斩断……

二

小镇有三四千人口，只有一条主街，总计不过三里路长。看来，谁要是和谁有过瓜葛，后来虽然中断了，要想从此不再相见，不在心中勾起往事，实在是不可能的。例如，我和一个姓万的人家——由一个寡母和四个女儿组成的家庭，只因八九年前有过一段短暂的瓜葛，后来相遇时虽然彼此都有意躲闪，但双方的心其实都难以平静下来。

谁也想不到，把我和万家母女扭到一起的媒介，竟是万

里之外、栖居他邦的一位陌生人——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妈。

对于这位不相识的姑妈，我从懂事时起，就几乎天天暗中诅咒她：盼她在太平洋上翻了船，喂鲨鱼！要不就在基隆、香港或纽约的街头出车祸，碎了尸！

此恨有因：四十年前，她美滋滋作着国民党少将夫人兼某城市集邮友人会名誉会长时，我还没有从无机盐、有机物转化成蛋白体——生命，更没有出世。当然，对她后来随夫潜逃台湾，我就也来不及表态。不过我敢百分之百地担保自己没有给她出谋划策，就连作婴儿时的哭声也绝不是对她的“哀鸣”。然而，六四年我在美术学院毕业，四五位名画家兼本院教授都预计我会留校作教师，或到美协、画院去从事专业创作，但我却被抛到这小镇的一所中学作了美术教师。

我来之前，美术教师原是由一位只会画体操示意图的体育教师兼任的。他特别擅长“一笔画”，例如一笔画出个公鸡，一笔画出个“尼克松”等等。我接课后，让学生画铅笔素描，画木方，画皮球。为了学生的乱堂的问题，某副校长还找我谈过话，要我向那位体育老师请教。我大约也说了些不太合时宜的话。

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失业多年的大学毕业生，解放后才有了正式工作，在外市的一所中学里当生物教师。他的兴奋象小孩子，他的世故水平也象小孩子。当时由于中苏关系颇似“铁哥们儿”，生物学——特别是植物学——几乎都被米丘林的“冬别里梨”和李森科的“小麦密植”、威廉士的“土

壤改良”所占据，而我的父亲却偏偏在谈起摩尔根的“遗传内因论”时来神儿，大赞其孟德尔在遗传学研究中的“豌豆试验”，结果，自学校建了农业基地后，他就成了常驻代表，负责土地深翻和底肥配比。大约是由于心情不好的缘故吧，他常常摆弄一厚册邮票。其实，他对一大厚册邮票无非是随便翻翻，只把眼睛较长久地停留在几张人头像上：达尔文、摩尔根、孟德尔、巴甫洛夫，对米丘林，自然也要投上崇敬的几眼的。

我幼小的时候，只把邮票当玩具。例如，什么异形——桃形、菱形、叶形——邮票啦，什么异质——金属的、尼龙的、赛璐珞的——邮票啦，我都作了书签，或悬在脖子上当长命锁，就连邮册上用小字标着“二百美钞”的中国第一套邮票——清代的“飞龙”邮票的一张，我也曾恶作剧地贴在自己的脑门上四处跑。什么大不列颠的女王头像，什么塞拉利昂的椰林邮票，我都没给予过应有的尊重。而且，假如我父亲那时就透露出这是我姑妈遗下的，我说不定还要往上吐几口唾沫，甚至把它投进炉火中的。爱屋及乌，恨她也就难免株及邮票。

但当我成了美院学生的时候，邮册却成了我的宝贝。不到一方寸的小小纸页上，多么清晰地缩印了举世闻名的美术珍品啊！《最后晚餐》、《莫娜·丽萨》、《给土耳其人的信》、《太阳和土地》……

人有了职业，就有了职业神经。在美院学生的眼中，整个世界——无论大自然或人间——几乎都是由美好的图画构

成的。没有图画，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乏味的。在我们看来，毁掉敦煌的一张壁画，烧掉法国罗浮宫墙上的一张油画，推倒俄国冬宫中的一具石雕，在心中引起的懊丧是不低于听到某省水灾或某省旱情严重的。不错，这有点迂腐，可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，迂腐和赤诚，精明和轻佻往往很难分清。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一厚册邮票时，老实说，就是他突然告诉我这东西是强盗、响马、土匪丢下的，我也不会放手了。只要我瞟一眼列宾笔下的《给土耳其人的信》，瞟一眼那从透视学、色彩学、光谱学中闪烁出的艺术家才气，就再也不会松手了。

但是，就是这本集邮册，因为有人从我父亲那里追溯出了它早先的主人——我的姑妈，也就成了我在“文革”中酿成所谓“罪行”的酵母。

家庭出身，社会关系，借着“现行问题”一发酵，我本人生活的图画，就不可能是优美的了。集邮册成了我“崇洋媚外”、“里通外国”的“铁证”。旬日之间，我逐级被加冕为“专政对象”。而这样的无妄之灾加诸我的头上，不觉也有好几年了。

镇上的清洁工忙于“革命”，没人再扫街，而街又是必须有人扫的。新的“清洁工”便要从各单位的“牛栏”中去物色。荣幸得很，我算一个。

早晨，扫过街，还要到镇革委会大院去点卯，听取这一天的安排——主要是听一听今日有无批斗会之类。

就在这里，我认识了万氏一家的户主——万老太太。

三

这老太太五十三四岁，娘家姓什么我不得而知，只因她死去的老头姓万，人们便都泛称她“万大妈”。

我一开始认识这老太太，还有个不小的误解，以为她也是我们队中人。每天早晨，我们这些“运动对象”到镇革委会大院去“候批、候斗”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因为个子较高而越显其瘦的老太太也进了院子。如果是那些“主任”、“副主任”、“常委”们因为夜间打扑克打得过晚而需要推迟“早朝”时间，这老太太又没有勇气去叩那神圣的门环时，便也蹑蹑地走到我们“牛队”成员的旁边站下。因为她脸上没有太多的神圣感，倒有几分惶惑不安，我们自然便把她当成我们的同命者了。

我们这些人聚成一堆站在墙根儿，等待着革委会办公室的门吱扭一响、从中走出个打哈欠的人来一挥手：“集合！”在这门响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里，便是我们这些同命者的小小的轻松期。在这时，你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力是多么旺盛：有的偷偷取笑，有的做着下蹲运动以作为被押上台时的准备活动……那时的一句俏皮话，哪怕是极普通的，其喜剧效果也可能比往常大上好几倍。例如，一位原来很有名的老中医耿某，一经有人偷偷请他摸脉，他就故意装作很正经地边摸边说：“肝木旺而脾土虚，谓之一反；肾水亏而心火盛，谓之二反；且又肺金当旺而不旺，谓之三反。呀！老弟害的是‘三反’”

大症！当以巴豆泄火，《本草》纲目上有云：七斗、八斗足去百疾……”

这一段有趣的隐语使在场者低声窃笑起来。我们“牛队”中收容的“好汉”也是来自各门各宗的。其中有原任镇党委书记老贺头，镇长老宋头，也有原来桂圆寺的禅师通真长老，还有二十年前的药铺天合祥掌柜温拐子……这些人在一起，不是自己主动为大家取笑以活跃气氛，就是大家拿他取笑借以开心。例如那个自认为深通《柳庄相法》的旧相士佟老槐，至今还认为他能推导出每人的未来，因之还常在我们面前显出一种不理凡人的神圣气儿；再例如通真和尚一遇有抽烟的人或嘴里有着残余酒气的人就躲开，坐在几米外的地方闭目养神，颇似打坐，结果倒往往成为被人们缠住、进行挑逗的对象。

看着我们这些人的穷开心，万老太太也有失神一笑的时候。看我们捉弄通真长老，她有时也会很友好地劝几句：“他这辈子够苦的了，你们别再捉弄他……”

每当万老太太与原镇党委书记老贺头挨着站的时候，老贺头往往称万老太太为“他万婶子”，万老太太则称老贺头“他老贺伯”，两人低声絮絮叨叨，竟好象是在家里闲聊天儿似的。

为此，我们曾放心地认为万老太太是我们“牛队”中人，兴许是当年哪个铺子、作坊的老板娘吧？直到有一天早上，这误解才被事实所打破。

吱扭——，革委会办公室的门开了。首先伸出的是个戴

着“国防绿”帽子的头，“年轮”在三十多，嘴里插着牙刷，嘴边溢着白沫。只这一瞬，我们队中的一切声音都结束了。连那位正在做下蹲运动的人也直起了身，而且还特意把胸脯子挺一挺，显出“请首长指示”的神气。

这时，我才知道万老太太并不是我们的同命者，而是另有身份的。

只见她蹑蹑地走到那位刷了牙、正仰着脖漱口的干部面前，等他把最后一口水吐了，才用请示的口吻问：

“今天……有我的事吗？……”

听她这样问，我觉得这口气与我们这些“专政对象”的口气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在她征询、请示之后，干部们对她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。有时，是不耐烦地一挥手说：“没你的事，回家吧！”可今天却显得分外热情，就象恭维似的往办公室让她：“哎呀，我的万大妈！闲了谁也不能让您老人家闲呀！您一闲，人们的脑子就要生锈！好家伙，那还了得！来来来，喝口水，抽支烟，正要跟您老人家商量今天的忆苦大会怎么开呢！”

我疑惑了：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：镇革委会会有个直属的“阶级教育宣讲团”，其职责就是忆苦思甜，任务就是向各单位革命群众进行“今昔对比”教育。据说，只要把“今”和“昔”一对比，那“当前形势一派大好”的结论就算是铁定了。无疑，这个宣讲团的成员必须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。例如这位万大妈，旧社会拣了半辈子垃圾、煤核，还讨过饭，腿上且有狗咬之

伤，额上又有棍棒之迹，满合格的。

有权恭听忆苦报告的人，自然都是革命群众。不过，我们这种人也有被格外恩准的时候。目的呢，据说是为了加速我们的“脱胎换骨”。这样，我也就有幸看到万老太太的演出了：

在一片“牢记阶级苦，不忘血泪仇”的口号声中，万老太太被两名干部搀到主席台上坐定。接着，大约有三五分钟的“进入角色”期，她揉了揉眼，一下子，当初站在我们“牛队”旁边那种温良的微笑，与老贺头亲切低叙时的平静之色都没有了，只见她一绷脸，又眨了眨眼，象一句一句背台词那样，嘶着声儿喊了起来：

“首先——让我们——高呼——无产路线——胜利万岁……”

她一开口就丢了“阶级”两个字，不过谁也不敢笑。接着，便以“我在旧社会，是拣破烂儿的穷婆子，讨饭的叫花子”起头儿，开始了忆苦。听得出来，她的苦是真实的，如果朴朴实实地说出来是会感人的；但她偏偏象是背台词儿，且又时时加上些“穷革命，富反动，两条道路水火清”之类的套语，内容的连贯性显然也被破坏了。

“单是靠拣破烂儿——拣煤核——怎么能活着呀——年头儿又不太平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她两眼一汪泪，抽泣了。她的抽泣是由衷的，似有无限心事。

有一次，正在她由慷慨激昂转入抽泣的时候，主持大会

的人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一阵。她连忙抹了抹眼，连声说：

“哦，知道了，哦，知道了！看我骂他……”

接着，她猛地抬起了头，把脸一绷，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喊道：

“谁说（阶级斗争）熄灭啦？谁说（阶级斗争）熄灭啦？这纯粹是和中（折衷）主义……阶级？眼下就有！台下就有！有个——牛鬼蛇神——态度——很不老实！他咬定自己个儿——不是资产（阶级）——不反动！这话——谁信呀？他有个姑妈——在蒋介石跟前儿！他爹——又是个捣腾蘑菇根（摩尔根）——捣腾豌豆（指写文章介绍孟德尔的豌豆试验）的不正道人！有这两条根儿——还有好秧子？再说，他——自己个儿——又是啥人？吃饱了就画画儿——还常画光屁股的——男男女女（石膏像素描）！闲极了就捣腾油（邮）票儿——左一张、右一张——跟外国挂钩！这要是跟我——拣煤核儿——拣破烂儿——比，他不是个资产（阶级）是啥？”

这显然是在指我了。

接着，她一边眨着眼睛，一边提高嗓门儿，喊出了别人要她喊的话：“我代表——革命群众——强烈要求——对资产的阶级——事先（实行）全面专政！”

有人带头喊口号了。台下也热烈起来。

我有些腻歪这老太太了。你死端骂我，何苦！

这当儿，万老太太已被请到讲台后的一排干部席中间座位上坐下。服务人员又是斟茶又是点烟。

紧接着上来的忆苦者是位衣衫破旧的老头子，蓬头垢面，

而且故意把衣襟敞开，露出系在腰间、作为腰带的草绳子。

这老头子可不怯阵，上了台就是一阵捶胸顿足的大喊：

“我说诸位哥们儿，爷们儿，如今这世上有没有个阶级？不用空口说，用眼看就成！旧社会，我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，拎着个打狗棍闯南北，是个真无产。如今你们再看，我混好了吗？没有！你们看我穿的是什么？连个剃头钱儿都挤不出来；可当初那些当书记的，当镇长的，穿的是啥，吃的是啥？他们每顿饭要是没二两酒、仨俩猪肘子下饭，你抠我眼珠子，这么一比，能说没了阶级？能说不是‘修正’（主义）？刚才我嫂子点的那个画画的坏小子，要多操蛋有多操蛋！他那个罪，要是全抖落出来，够个枪崩的份儿！别的甭说，他硬要我闺女……唉，没法说了！”

我这时才判断出来这位忆苦者名叫万世宝，旧社会那阵儿有个外号叫“万大兜子”。我也是这时才知道：他原来是万老太太的小叔子。

万世宝提起的那段隐事，确有影子，但显然被他歪曲得离真相十万八千里了。我的脸与其说是被羞红，还不如说是被气红了。

此时，我再看万老太太，她的神情却突然变得很异常。自万世宝亲切而恭敬地提到“我嫂子”三个字，万老太太的脸也一下子红了，由刚才喝茶、吸烟时的小陶醉，一易为无地自容的局促、慌乱、羞惭。她站起身来，红着脸对身旁的干部请示着什么，无论两边的干部怎样拦，她还是慌慌张张退下了台，从舞台左角的入门钻了出去。